

## 研習心得報告

鄭佳佳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作為人民大學宗教學系佛教方向的博士生，我是懷著驚喜且期待的心情參與此次“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關中·外緣”的。研習營雖以文史探討為主，與我的宗教學專業關涉不多，我作為外行，亦有啟發與收穫。

來到西安這座十三朝古都，我常常會被邊地與中心的話題所吸引。唐代長安作為世界性大都市，海納百川般吸納了各種宗教與文化。同樣作為世界性大宗教的佛教而言，依託絲綢之路的商貿往來與唐王朝的強盛國勢，由東漢以降的東傳漢土，到唐時既在國內綻放出絢爛的佛教文化，又能被唐代統治者藉以作為意識形態的強有力工具來統治上至皇室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的精神世界，還能以此向四周國家輻射開去，無遠弗屆，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眾多傑出人才湧向長安，共同造就了盛世大唐。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邊地情結”的陰影始終是揮之不去的。我們能從窺基的自述，也能從道宣撰述的描寫，一窺當時僧人對佛教發源地印度，尤其是五印度中的中印度，心存強烈的朝聖狂熱心理——視印土為“中國”，而以中國為“邊地”。但隨著唐王朝的強盛與印度的衰落，這種“邊地情結”轉而由人為建立起來的“聖地崇拜”與宗派系譜的不斷構建而將“中國觀念”紮根於對母國的信心與敬仰，反而吸引了大量認為漢地有大乘氣象的胡僧與梵僧紛至沓來，入華傳經、譯經，參與宗教活動，甚至涉身政事。而今，我們雖眼見西安遠不如往昔那般是世界中心的大都市，但西安依舊是西北地區的中心城市。所謂的“邊地”與“中心”永遠都只能處在動態的比較量級當中才有意義，沒有一定之說。

關於“淫祠”這個定義，我曾在課上與同學討論過。所謂“淫”，大抵當作過多、過濫的意思來理解會較為合適。“淫祠”對應的是“正祠”。《禮記》認為，凡能達到法施於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勞定國、或能禦大災、或能扞大患等五種均可列入祀典。“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鄉野之間，民眾好巫尚鬼，偶見靈異，輒建廟祭祀。“靈驗”，求之得福，這一點很重要。《左傳》說，“奉厲為祀”，即是將不得好死的厲鬼祭祀起來，以防禍害百姓。因存著恐懼鬼神害人的心理而祭祀，也是導致民間淫祠氾濫的重要原因。佛教、道教出於護教心理，有諸般破淫祠邪神的傳統做法，屢見於《僧傳》與《道藏》。國家政府為了管控與收攏民心，歷朝歷代也會頒佈法令，著令地方官員一方面將地方上靈驗且造福百姓、信眾眾多的神祇上報朝廷，獲得朝廷加封賜額，另一方面將不合祀典且影響力不大的野神淫祠予以搗毀。

還有若干討論中的問題值得商榷。諸如神廟前面搭建戲臺子的做法，既有傳統神佛誕辰的“娛神”活動，如迎神賽會、巡神遊境的一個環節就是看戲，兼有促進宗族感情與地方鄉親聯繫的功能，可能私下會有結親、談生意等個人行為；也有個人宗教需求下的“酬神”活動，即向神明許願後，果然如願受益，請戲班子唱戲來酬謝神明。淨土宗本為“寓宗”，在宋之前，寄寓在台、禪等宗派內，有自己特定的修行法門與淨土觀念，但沒有獨立的組織和法嗣傳承制度，在宋以後才開始獨立起來。淨土宗的祖師都是後世評定的，本為台、禪等宗的祖師，但同時兼修淨土卻影響廣大。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諸宗教義當中，大多涉及淨土觀念。現今被概括為“教遵天臺，行在禪宗，導歸淨土”。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然參訪須彌山洞窟與須彌山大佛時，我被寧夏固原的佛教塑像文化所深深折服。在彭陽參觀殷墟遺址發掘工地時，深感歷史滄桑與人事無常。

這次研習營的課程學習與參訪活動帶給我多方面的體驗，令我開了眼界，長了見識。我深感，隔行如隔山，雖說文史哲是一家，但要能旁涉且深入殊為不易。另外，作為宗教學系的博士生，我也感覺到大家在讀佛教文獻和民間信仰材料時，除了就文本來作個人闡釋的同時，尚需要瞭解必要的宗教學知識背景與基礎的佛教教義，方能理解宗教本身的情懷、思想與歷史大背景下宗教事件的緣由。湯用彤先生指出，研究佛教需有“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如僅憑陳跡之搜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得其真”。今天看來，依然深達佛教研究的精髓。

寥寥數語，僅供看家笑爾。